

藏書印之類型與學術價值探論 —以傅斯年圖書館館藏為例

A Study of the Types and Academic Value of
Collector's Seal—Take Fu Ssu-Nien Library's Chinese
Rare Books Collection as an Example

張家榮 Chia-jung Chang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助理

Assistant, Fu Ssu-Nien Libra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E-mail: soo521@asihp.net

【摘要 Abstract】

本文以傅斯年圖書館館藏善本古籍印記為考察對象，分別探討文人使用藏書印之得與失、傅斯年圖書館館藏印記的特點和創新應用，以及藏書印的類型與學術價值等問題。希望透過豐富的實例呈現與議題的討論，能進一步引發研究興趣並提供學界參考。

This thesis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hinese rare books seals of the Fu Ssu-Nien Library, respectively exploring the gain and loss of literati using s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ve application, and the types of the seals and their academic values. Hopefully through the abundant presentation of living examples and discussion of subjects, we can further arouse interest in research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academic circles.

【關鍵詞 Keywords】

藏書印；藏書家；印記資料庫；傅斯年圖書館

Collector's Seal; Book collector; The Database System of the Fu Ssu-Nien Library
Seals Data; Fu Ssu-Nien Library

一、前言

圖籍是人類智慧所創造，不同時地的人們著作、收藏與閱讀，並有時留下紀錄。各地文人自有風尚、趨向，雖並非都會留下痕跡，但至少，就中國古代而言，文人們著書、購書、藏書與讀書總是值得留下隻字片語。儘管是些許字句，書上的印記卻是一種特殊記號。可這麼說，若有兩部相同的古書在吾人前面，但僅一部有印記，雖說書的價值與印記多寡並無絕對關係，但人們通常會對有印之書產生興趣。有時候，可能僅是鮮明朱紅吸引人的目光；有時，為了看懂結構特殊的篆體印文，觀者佇足思索；更多時候，人們特別想知道此書到底為何人舊藏。

從古到今，負有責任或具所有權的人，都能在特定物品上鈐印。是故，千百年來的圖籍藏家，有的單純玩賞，有人細細閱讀。但不約而同的習慣使然，流傳到今日的珍貴圖書文獻上，既有值得學習的古人智慧，也留下了可讓人用心體會、系統考察的朱紅點點。篇題謂之「探論」，可從幾點說明：（一）範例印記皆經筆者目驗整理並可延伸查詢鈐蓋之圖籍來源；（二）利用與介紹時興數位典藏資料庫成果；（三）依所見藏印歸納出一套新的分類系統，並嘗試說解印文涵義；（四）偏重實例印證的學術價值論述及藏印考釋經驗分享。

二、文人與印記

自先秦至近代，印章已廣泛應用幾千年。從使用族群來看，不論官印與私章，都是取信之用，且知識份子都是用印的主體。當藝術融入於人文素質，印章也漸漸具有藝術內涵。所謂「題款」，指在畫上題寫詩文，叫做「題」，從體裁上分有題畫贊、題畫詩、題畫記、題畫跋、畫題等；而在畫上記寫年月、簽署姓名別號與鈐蓋印章等，

則稱為「款」（沈樹華，2009，頁8-9）。唐宋時代的畫家與收藏者開始在畫卷上題款與蓋章，除表創作權與擁有權，亦宣示了印記對藝術的畫龍點睛之用，是以，印章成為畫藝重要組成。當然，吾人亦不能忽略，當雕版印刷更便利於圖書出版，藏書成了文人習慣風尚後，同樣具備實用與藝術性的圖書「題跋」與「鈐印」，亦成了另種值得探討的朱墨燦然。

（一）「題款印記」與「題跋印記」

在此談論印記，雖主要針對圖書，但因概念與用法同源，論點可以補充，故書畫印記之討論有其必要。傳統中國繪畫是融「詩文」、「書法」、「篆刻」、「繪畫」於一體的多面性藝術，這是中國畫的獨特表現。畫家用毛筆題寫在畫上的詩文，巧妙搭配朱紅印記，不僅有助深化畫境，同時也充實了畫面布局，此乃畫家藉以表達感情，突顯感染力的獨特方式。那些畫者本人的題款用印，就是所謂的「書畫題款印」。

秦漢到魏晉是篆刻藝術的第一個輝煌時期。從眾多實物中，我們清楚看到「規矩方正，平實飽滿」的漢印如何成為後世篆刻典範（王北岳，1997）。隋唐以後，由於紙張普及，不僅文書鈐印需要大增，書畫創作亦漸興盛。唐宋以前，印章主要為了實用，後來與書畫發生聯繫，逐漸從實用趨向藝術範疇。宋以後，題款蓋印成為文人習慣。當畫技日益成熟，佳作不斷產生，普遍的收藏活動應運而生，書畫中出現了文人或藏家的「題畫跋」語，同時，在相映成趣的藝術考量下，也有許多鈐蓋其中的書畫藏印，這就是基於收藏需要與兼顧畫面的「書畫鑒藏印」。書畫題款與印記具有藝術形式上的意義，與畫面的形象一樣，它是完整畫面布局的重要組成，另外，這些文字所蘊含的豐富內涵，不僅提供許多訊息，也是鑑定的重要參考。

當古人收到好書時，常會在卷首或卷尾空白處寫上一段或長或短的文字，這樣的文字稱為「題跋」。「題」字，原指額頭部位；「跋」字，指足後部位，因為位置有別，所以古人有「前題後跋」的說法。《文體明辨》中謂「題跋者，簡編之後語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跋」（明·徐師曾，1997，頁51）。意思是說，原先題跋指原書寫成時就有的內容，就像現代出版品上的序文一樣，後來則又指古人在已出版的書上手寫下的文字。本文所指稱為後者。題跋的內容，有敘得書經過、觀書心得、購書感想、版本年月、學術價值與流傳過程等，對文獻學科（如版本學）的探討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題跋與印記的關係相當密切，好比一種共生的概念，因為文人題跋前後，總常鈐上幾方印以表示跋語者，或曾校讀該書。有些題跋、印記的呈現，更與題款、印記的藝術表現雷同，因而它們對該書與書畫的知識考察都成了重要線索。此外，題跋前後之印與書上它印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只是因為通常與寫跋者有關，故有時題跋將成為辨識印記的輔助文字，而印記有時則是考察題跋作者的參考。如傅斯年圖書館（簡稱傅圖）藏明嘉靖間覆宋刊本《脈經》前扉頁有唐翰題（字鵠安，1816-1896）跋語二則，他先判斷此書乃明翻宋本，並對字體與內容評價，接著又把版本考察訊息補充在第二則，這些內容對版本審查具備參考價值。前後兩跋，後跋字體略小約低二字，一眼可識題寫先後；跋後皆有印記，前白文「唐/翰題」方印，後「萬柳/亭長」略大方印，符合一般鈐印之「名號次序」原則與「上輕下重」的審美要求（沈樹華，2009，頁 171-173）。二跋與印記亦有互證之功（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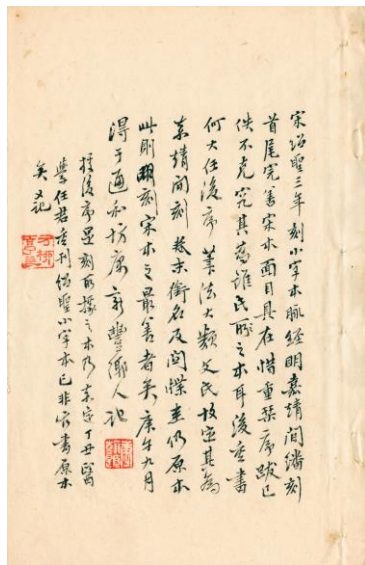


圖 1 唐翰題手書題記與鈐印

（二）鈐印的得失

文人熱中書畫賞鑒，利之所趨，一些人用盡巧思仿製，若不慎以假當真，豈不有損賞藝初衷。這是張彥遠（812-877）討論畫論外，特別提出的根本問題：「雖然，自古及近代御府，購求之家藏蓄，傳授閱玩其人至多，是以要明跋尾印記，乃是書畫之本業耳」（唐·張彥遠，1993，頁 130）。印記所以可貴，在於其提升了畫面層次，它亦有助於文人獲取真實藝術，此乃鑒別上的功能。

有鈐印之古籍，可看性頓時提高，價錢也水漲船高；若舊藏與篆刻者為名家，這部書的學術、藝術價值亦會受到注意。同樣地，若想獲得正確知識，在藏書前必須判斷版本的普遍要求下，有關鑒別的參考價值更會受到重視。雖然印記提供知識，也有藝術價值，但它同樣是一種兩面刃。有人故意鈐上印記，目的為了惑人心思、賺取暴利；有人雖非故意，但因學識不足，誤判版本後鈐上的印記，反而讓人混亂。另一方面，即使收藏者有絕對的支配權，要如何鈐蓋純粹個人自由，但因為圖書鈐印與書畫

鈐印相同，都具備特殊的學術、藝術性，故胡亂鈐蓋反倒會減低價值。對於書畫鈐印原則，論者謂：

印章在中國畫佈局中的作用是很微妙的，印章除了要求使用得當，還要求印章篆刻的風格能與繪畫和款書的風格相協調，盡可能地使畫、款、印的藝術風格得到完美的高度統一。收藏家往往喜歡在收藏品上鈐蓋收藏印。收藏印在畫面所占的空間位置是否適宜，也會影響畫面的效果。（沈樹華，2009，頁 188）

若說到書畫施印的反面例子，吾人立刻能想到項元汴（1525-1590）和乾隆皇帝。如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圖〉，該圖筆法細膩且配色巧妙，讓觀者往往興起思鄉情懷，但此圖歷經收藏，滿幅盡是藏印，大大影響了畫面美觀，項元汴、乾隆藏印正好皆在其中。藏書印的得失問題，葉德輝（1864-1927）的說法值得注意：

藏書必有印記，……至今收藏家資以考證，名賢手澤，固足令人欽企也。然美人黔面，昔賢所譏；佛頭著糞，終為不潔。曾見宋元舊刻，有為書估偽造各家印記以希善價者，有學究市賈強作解事以惡刻閒印鈐滿通卷者，此豈白璧之微瑕，實為秦火之餘厄！今為言印記之法，曰去閒文，曰尋隙處。（葉德輝，2005，頁 53-54）

針對項元汴帶起的鈐印陋習，葉氏提出了少用閒章、印文單純、蓋印勿多、避免遮字與注意位置等原則，他把鈐印之失比作焚書，更可見此風之盛。但翻覽明藍格鈔本《玉堂類藁》，卻可見項元汴「墨林」、「子京/珍祕」印規矩蓋在書前、書後下方空白處；諷刺的是，明嘉靖刊本《烏鼠山人小集》中，「葉氏/德輝/鑒藏」、「觀古/堂」印就正好蓋在字上影響到閱讀，看來項元汴的鈐印陋習是否適用於圖書上，尚有待討論，而葉德輝的言行相悖則有實例可證。

三、傅圖館藏善本古籍印記

（一）傅圖館藏印記之特色

傅圖典藏大部分來自各地民間藏家，不僅內容豐富、型態紛呈，當中附載的印記也多采多姿，相信亦能有以小見大的討論效果。主要特色為：

1. 大量集中性

傅圖接收群碧樓精華，鄧邦述（號正閭，1868-1939）大量而集中的藏印必然可見。在此，研究者可以不用擔心真偽問題，同時，若經過館方的妥善整理，讀者也能快速觀覽並獲得完整素材。筆者目前所見鄧氏藏印計 42 方，這些印記包羅萬象，有鑒藏印（如「正閭/審定」）、齋室印（如「群碧/樓」）、特藏印（如「三李/龕」）、校讀印（如「群碧/校讀」），也有各式各樣的閒章（如「從吾/所好」），這對鄧氏藏書研究，具有不錯的參考價值。

再者，過去日本人為續修《四庫全書》，其「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專以稀見精鈔、稿本為蒐集目標，經過許多前輩學人的努力，其豐碩成果部分轉移到了傅圖。今日，我們在這批難得稿、鈔本上，往往可見到不少往昔名家集中的印記。如數量可觀的柯逢時（字遜庵，1845-1912）舊藏，即從該單位接收而來，這對柯氏生平及學術研究，實具參考價值。

另外，像北宋景祐本《史記》、宋蜀刊本《南華真經》、南宋本《文苑英華》等，不僅為傅圖珍藏，更因遞藏過程皆與名家傅增湘（字沅叔，1872-1949）有關，是故，吾人能從中看到傅氏相對豐富的藏書印。這幾部宋版書上的獨特印記，突顯了他對古代文獻的重視，細察內容，種類也很多樣，有鑒藏印（如「沅叔/審定」）、特藏印（如「藏園秘/籍孤本」），也有一些閒章（如「校書/亦以勤」），這亦能據以研究其藏書學術。

2. 明清江、浙藏書風氣的縮影

隨著宋代政府南遷後中國文化中心的南移，到了明清時期，各種因素交互影響下的江、浙二省不僅成為中國文人學者的最大源地（葉忠海、羅秀鳳，1994）。值得關注的，自從明清以後，江、浙兩地的藏書風氣快速的蔓延開來，成了私家藏書最密集的兩個地區。受限於物質條件，古人的生活圈及活動範圍無法很廣，而藏書家想找書買書，也一定不會離開住地太遠。因傅圖館藏大都來自江、浙民間，吾人在這些圖籍中自然可看到不少江、浙藏書家印記。若去分析原為鄧邦述收藏的宋刊書棚本《李群玉詩集》與《碧雲集》二書，剛好可明顯看到此種情況。

《李群玉詩集》中共有古今文人印記 97 方，略依時代排列並註明個人鈐印數量，分別為（1）文徵明（長洲〔今蘇州〕人，1470-1559）有 15 方。（2）王寵（吳縣〔今蘇州〕人，1494-1533）有 2 方。（3）張雋（吳江人，?-1663）有 2

方。(4) 季振宜(泰興人, 1630-?) 有 34 方。(5) 徐乾學(崑山人, 1631-1694) 有 2 方。(6) 安岐(原籍天津, 經商長居揚州, 1683-?) 有 6 方。(7) 馮新(金壇人, 生卒年不詳) 有 7 方。(8) 黃丕烈(吳縣人, 1763-1825) 有 9 方。(9) 潘奕雋(吳縣人, 1740-1830) 有 1 方。(10) 忻寶華(嘉興人, 生卒年不詳) 有 2 方。(11) 鄧邦述(江寧〔今南京〕人, 1868-1939) 有 16 方。(12) 翁斌孫(常熟人, 1860-1922) 有 1 方。

可知, 這部書流傳到鄧邦述為止, 始終不出江、浙地區, 也開始有借觀(潘奕雋)、借鈔(翁斌孫)事蹟, 說明此區藏書與圖籍交易風氣之持續熱絡。需要說明的是, 安岐雖然原籍不在江、浙, 但因他在此處有長期的收藏活動, 在此也將他列入範圍內討論。《碧雲集》的印記及流傳狀況類似, 在此不另舉例。

這兩部書從作者李群玉(808-862)、李中(920-974)至出版商陳起(約1174-1258), 到藏書家鄧邦述乃至於歸屬傅圖, 將近有 800 年的歲月, 這是文士們的時空接力; 從南至北(主要為江浙), 乃至東南海隅的臺灣, 這是特殊時空下的移轉機緣。回顧歷史可知, 古籍的流傳沒有「絕對」的脈絡可尋, 若硬要說有的話, 因為明清江、浙地區藏書風氣的興盛, 數量龐大的江、浙藏書家們確實創造了這種較高的流通機率。

此二書都為南宋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刊印的所謂「書棚本」, 皆經過明清多位著名藏書家遞藏, 這不僅是江、浙地區藏書風氣的縮影, 且在古代出版、藏書史上也具有典型意義與研究價值(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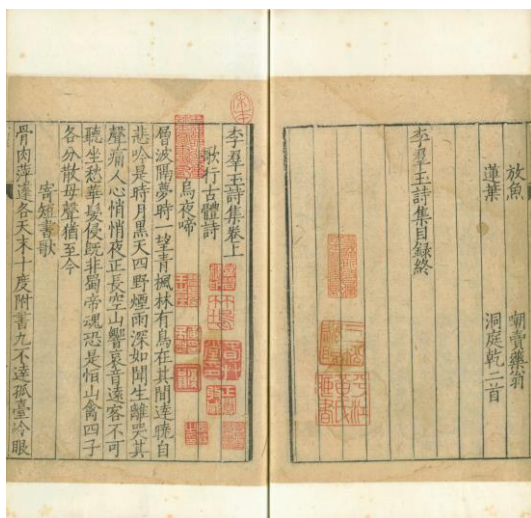


圖 2 南宋刊書棚本《李群玉詩集》

3. 個別特殊性

一些量身訂作的印記，僅見於某些書上。例如，乾隆皇帝編纂《四庫全書》時，所徵集的各式「四庫底本」、「四庫採進本」四處流散，在傅圖藏舊鈔本《獨醒雜誌》、《歷代宅京記》封面上可以看到「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送到鮑士恭家藏/獨醒雜誌壹部/計書壹本」、「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送到鮑士恭家藏/宅京記壹部/計書壹本」諸印。又，古璽印收藏家高慶齡（字南鄭，?-1883），為輯藏的《秦漢印章拾遺》所刻的「秦漢印章拾遺」印，此印質感細膩，鈐於書前也具「書名頁」的效果。

王錫爵（號荊石，1534-1611）是明代著名學者，書法亦頗可觀。明嘉靖間武陵顧氏翻宋刊本《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上有其「荊/石」、「望鶴/來」等印，這些印不同於他常見的書畫印，筆者目前僅見於此書。清徐鉉（字電發，1636-1708），擅長詩詞書畫，他的書畫用印不難見到，其藏書印就少見多了，如元刊本《重刊巢氏諸病源候總論》有「舊史/徐鉉」、「松風/老人」與「吳江菊/莊徐氏/珍藏書/畫圖記」等印。

另，清乾隆三十年（1765）刊本《海寧縣志》更有值得說明的地方。此書為浙江海寧藏書家吳騫（字槎客，1733-1813）舊藏，故有其「拜經/樓吳氏/藏書」印，當時吳騫還邀了好友陳鱣（字仲魚，1753-1817）來一起校勘，故書中亦有陳氏「仲魚/過目」印。特別的是，該書卷八〈選舉志〉、卷九〈列傳〉中某些人名傳文的上、下處則鈐有印記。若進一步審視，可發現這些人名就是印記之主人，如「履泰/之印」鈐在〈循吏列傳〉中曹履泰（字方城，浙江海鹽人，?-1648）上方（圖3）；「祝咸大/孟綸氏」、「一字成齋/又號南沁」等印，上下接續鈐在〈孝友列傳〉中祝咸大（字孟綸，浙江海寧人，生卒年不詳）上方；「聲山」印，鈐在〈文苑列傳〉中查昇（字聲山，浙江海寧人，1650-1707）上方；「海寧楊氏/耑木藏弄/翰墨圖書/傳之有緒」印，鈐在〈文苑列傳〉中楊中訥（字耑木，浙江海寧人，1649-1719）上方。



圖3 曹履泰傳文上方的鈐印

這幾位印主的生活時代都早於這部書的出版時間，所以不會是他們自己所鈐。那麼，為什麼這些印記會出現在書中呢？吾人可從幾點來推測：1. 這些人皆非著名書畫家或收藏家，故它們是偽造的可能性很低；2. 因為吳騫重視鄉邦文獻的收藏整理，所以就算此書的版本較晚，他仍細心校勘全書；3. 吳騫除了熱中藏書，他也喜歡金石、書畫與印章的收藏；4. 這些印的部分訊息有傳文所不載者。綜上，推測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當吳騫進行校勘工作時，發現自己收藏有這些傳主的印章，基於對同鄉前輩的尊重（也或許是希望能留下紀念），也想要讓印記補充傳文之不足，所以才在書中蓋了這些印記。而這些獨有或少見的印記，也都具備研討價值。

（二）傳圖館藏印記資料庫

印記對於版本考證，遞藏源流或篆刻，都是極為重要的研究資料。然而，如何有效率地分析散置的印記與整合考釋成果，在過去是曠日廢時的工作。所幸，透過圖籍數位化，擷取印記圖檔並建置資料庫，使得印記展露應用的曙光。傅斯年圖書館藏印記資料庫系統（簡稱印記資料庫，<http://ndweb.iis.sinica.edu.tw/sealdb/System/index.jsp>），不僅將傳圖藏善本古籍上原鈐之收藏家、鑒賞者、題識者等印記，予以數位化保存與析錄，更透過後設資料建置使圖籍上的「印記」擁有系統化的知識內涵。需要引發供給，現今因為篆刻書畫、圖書文獻學等方面的需求，除傳統印譜持續出版外，符合各式主題的印記圖錄也相繼出現。在此仍以文獻學相關之「藏書家印鑒」為例說明。如《中國藏書家印鑒》（林申清，1997）、《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林申清，2000b）、《日本藏書印鑒》（林申清，2000a）等。這些作品針對文獻學需要而編，以印主為主軸收錄印文，大致按時代編排，並有印主簡介與索引，提供使用者檢索上的方便。又，《善本藏書印章選粹》（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1988），也以印主為主體，編有目錄索引，除方便學界利用，兼及介紹館藏的教育功能。

近年來隨著資訊發展，如《二南堂印譜》除了以明清以來 491 位篆刻家的 1 萬 915 枚印章為收錄內容，更附有印文的彩色圖檔光碟供讀者使用（二南堂工作室，1999）。值得注意的是，無遠弗屆的網路讓各種學術跳脫紙本，訊息既能迅速傳遞，伴隨時刻呈現與更新的圖文介面，各種精彩討論也將不限時空。而篆刻需要圖文並茂的藝術特質，當然也使它進入了網路世代。像「真微印網」（<http://www.sealbank.net/mainHome.asp>），除了各式篆刻資料與數位印譜外，該網站還提供了印文、刻者的

資料庫檢索瀏覽功能，但要看到詳細資料則需額外付費。又如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建置之「藏書印の世界」(<http://www.ndl.go.jp/zoshoin/index.html>)，則以年代為序從館藏中挑選出 30 位印主並展示藏印、簡介生平及藏書梗概。「印記資料庫」有別傳統印譜，除具備清晰影像、文字資訊與能提供各種檢索方向外，還能提供系統化的印記資訊且定時更新。結合網路的開放性，印記資料庫相較於篆刻相關網站，不僅影像品質穩定，檢索功能更全面，在軟硬體的更新維護，乃至於開放使用上，都顯得更加便捷。因為建置目標本來就不同，上述提及的印記資料在內容上顯得雜亂，如有的沒有檢索功能而不便查詢，有些對於印記的主體意義（即印文、印主與刻者）未提供訊息，有的則受限載體性質而更新緩慢。因而，在傳統文獻製作基礎上導入新技術，具有檢索、瀏覽功能的印記資料庫，實能成為新的參考工具。

印記資料庫的「印記導覽」功能，藉由不需帳號登入即可瀏覽的選項（如以形狀、字體來分），讓一般使用者進行簡單閱覽，不僅具社教功能，也能激發研究意願。而「進階檢索」專為研究者規劃，經線上申請並取得帳號密碼後即能查詢。使用者可以限定時代、來源搜尋，也能直接鍵入印主、印文與篆刻者關鍵詞檢索。進入印記資料畫面後，清楚呈現的印記資訊、影像與跨資料庫的資源成了研究者的學術利器。當使用者查詢印記資料庫時，除了印記資訊外，更有延伸的參考欄位。如「參考資料」可供查找印主資料之參考；「其他印譜資料」能看到考證該印記的印譜資源。另，使用者除可瀏覽經過處理的「印記圖檔」外，也能透過「館藏鈐印處」連結到「傅斯年圖書館藏善本古籍數典系統」(<http://ndweb.iis.sinica.edu.tw/rarebook/Search/index.jsp>) 瀏覽該印記所在的圖籍書影。若點選印主姓名，則能連結至「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資料庫」(<http://ndweb.iis.sinica.edu.tw/fsnpeople/Search/index.jsp>)，快速閱覽人物資料。這將使印記成為可以靈活運用的系統知識，下文探討藏書印之學術價值時則會舉例說明。

四、藏書印的類型

對藏書印分類的各種代表性論著，如《中國藏書家印鑒》分「姓名印」、「別名字號印」、「齋室名印」、「生年行第印」、「仕途功名印」、「收藏鑒定印」、「校讀印」、「閑章」與「其他」等九類（林申清，1997，頁 2-5）；《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

研究》分「名號」、「里爵」、「鑒賞標志（含鑒定、校勘等）」、「箴言警句」與「雜記內容（含肖像印）」等五類（周少川，1999，頁 252-259）；《中國古籍版本學》分「反映藏書家的有關情況（含名號、堂號、仕履、門第、里居、行第、肖形、紀年等）」、「反映鑒賞校讀情況」、「反映藏書家的志趣」與「告誡後人」等四類（曹之，2002，頁 570-575）。上述分類有多有少、精粗不一，且都沒有交代來源與解釋印文。本節除參考前作外，亦根據實際藏印性質而細分之並解說印文涵義，以期能得到一個較完備、清楚的分類體系（本節範例皆可於印記資料庫檢索觀覽，並獲知所鈐圖籍之來源訊息）。

（一）姓名印

這是最常見也是最通用的藏書印，常以郡望、籍貫冠前，主要在表明個人與宣告擁有權。例如，藏書家孔繼涵（字體生，山東曲阜人，1739-1783）的「孔繼涵」聯珠印、收藏家梁清標（字玉立，直隸真定人，1620-1691）的「梁印/清標」白文長方印等。但也有比較特殊的，如清代江蘇儀徵有位名叫許珩（字楚生，生卒年不詳，撰有《周禮經注節鈔》、《周禮注疏獻疑》等）的經學家，後來另一位文人剛好也叫許珩（字君耆，生卒年不詳），為了表示對前人學者的仰慕與順便宣傳自己，他則刻了一枚藏書印：「與儀徵許/楚生同姓名」（圖 4）。



圖 4 許珩藏印

（二）別名字號印

除了姓名，古代文人大都還會有字、號，這樣的內容表現在藏書印上，也常以郡望、籍貫冠前。例如，藏書家甘鵬雲（字藥樵，湖北潛江人，1862-1940）的「潛江甘/鵬雲藥/樵收藏/書籍章」朱文方印、文學家馬其昶（號抱潤翁，安徽桐城人，1855-1930）的「桐城/馬抱/潤軒/藏書」印（圖 5）、藏書家蕭敷政（字蒲村，江西泰和人，?-1924）的「泰和蕭/敷政蒲/邨氏珍藏」朱文長方印等。



圖 5 馬其昶藏印

(三) 齋室名印

齋室(含樓園亭閣等)名可表文人志向,也多有深刻寓意。與現代圖書館使用館名印一樣,此類藏印也是人人必備,亦常以郡望、籍貫冠前。例如,藏書家趙烈文(字惠父,江蘇陽湖人,1832-1893)的「天放/樓」印(圖6)。藏書家王澐(字伯沆,江蘇溧水人,1871-1944)的「溧水王氏無想山房藏書」朱文長方印。學者王懿榮(字廉生,山東福山人,1845-1900)的「翠墨/園」白文方印等。



圖6 趙烈文藏印

(四) 里居印

有時候,印文中除了有郡望、籍貫或所在古地名等資訊,更有形象描述居住地或環境的藏書印。例如,藏書家金檀(字星輅,生卒年不詳,先世為安徽休寧籍,後徙浙江桐鄉)的「家在/黃山白/岡之間」白文方印,即是在遙想祖先的居住地安徽休寧(休寧正好在安徽黃山與白岳山間)。又,思想家王韜(字紫銓,江蘇長洲人,1828-1897)的「家住吳淞第六泉」白文方印,據唐張又新《煎茶水記》載,最適合煮茶的水分七等:第一是「揚子江南零水」,第二是「無錫惠山寺石水」,第三是「蘇州虎丘寺石水」,第四是「丹陽縣觀音寺水」,第五是「揚州大明寺水」,第六是「吳松江水」,第七是「淮水」(唐·張又新,1983,頁809)。是以,此印除說明家居「吳淞江(即蘇州河)」附近外,更隱含吳淞江水古來名列第六泉的典故。藏書家吳騫的「小/桐谿」印(圖7),明確點出了他乃是住在浙江海寧縣長平鄉內新倉里的小桐溪附近。



圖7 吳騫藏印

（五）名號齋室里居綜合印

還有一些體積較大的藏書印，其描述的資訊則可以包含上述四項內容。例如，藏書家趙烈文的「趙烈文字惠父號能靜僑/於海虞築天放樓收度文翰之記」朱文長方印、藏書家張師亮（號筱漁，安徽桐城人，生卒年不詳）「皖南張師亮/筱漁氏校/書於篤素堂」朱文長方印、文人朱樸之（字淹頌，直隸永清人，生卒年不詳）的「永清朱樸之字淹頌號玖聃/滂喜堂藏經籍金石書畫記」印等（圖 8）。



圖 8 朱樸之藏印

（六）郡望堂號家族印

每個地方都有其特殊傳統（如藏書風氣），這種喜好往往也會變成某戶人家的家族傳統，這類印記表達了此種狀況。例如，藏書家汪啟淑（字秀峰，安徽歙縣〔今徽州〕人，1728-1799）的「新安/汪氏」朱文方印，代表汪家在徽州（古稱新安）的藏書傳統，其子汪庚、其孫汪其佩也承繼了此書香家風。學者王念孫（字懷祖，江蘇高郵人，1744-1832）的「高郵/王氏藏/書印」白文長方印、「淮海/世家」印（圖 9），代表了王念孫、王引之（字伯申，1766-1834）父子相承的學術與藏書，也突顯了高郵史稱「淮海首邑，廣陵名區」的特殊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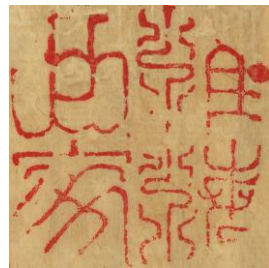


圖 9 王念孫藏印

另藏書家陶澍（字子霖，湖南安化人，1779-1839）的「安化/陶氏」朱文方印，亦代表了從其父陶必銓（1755-1805）到其子陶枕（1832-1896）的三世聚書家風。

（七）行第印

某些藏書印則能表示印主在家（族）中的排行。例如，鄧邦述的「正閭/鄧七」印（圖 10）、藏書家祝壽慈（江蘇如皋人，生卒年不詳）



圖 10 鄧邦述藏印

的「東臯祝/三鑒賞」白文長方印、藏書家袁克文（字豹岑，河南項城人，1890-1931）的「袁/二」朱文長方印等。

（八）仕途功名及家世印

某些藏書印顯示了印主的功名、任官經歷和家世。在重視功名、家世的古代，這也是比較多的類型。例如，藏書家盛昱（字伯羲，滿洲鑲白旗人，1850-1899）的「聖清宗/室盛昱/伯羲之印」朱文長方印；學者周鑾詒（字仲澤，湖南永明人，1859-1885）的「丁丑/翰林」白文長方印，說明他光緒三年（丁丑年，1877）中進士並授翰林院編修的事蹟；學者宋筠（字蘭揮，河南商丘人，1681-1760）的「己丑進/士太史/圖書」印，則記載了他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年，1709）中進士後，授任翰林院檢討（翰林院官古稱太史）的經歷（圖 11）。



圖 11 宋筠藏印

（九）收藏鑒定印

一般而言，古代文人買書前會先鑒別版本，到手後也會評價內容，這些事後蓋在書中的鑒藏印，大都成了品質保證。例如，藏書家季振宜的「宋本」朱文橢圓印；鄧邦述的「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與「嘉靖刻本」（圖 12）等朱文長方印；藏書家繆荃孫（號藝風，江蘇江陰人，1844-1919）的「藝風/審定」朱文方印等。



圖 12 鄧邦述藏印

（十）宣示特藏印

具有價值的特殊收藏，不僅可能是書齋的命名來源，同時亦是誇耀成就的典藏，相信人人都樂於擁有這種印章。例如，鄧邦述的「三李/盦」印（圖 13），即是在獲得《李群玉詩集》、《碧雲集》與《唐李推官披沙集》等三部宋刊書棚本（因為作者都剛好姓李）後所刻。

吳騫的「臨安志百/卷人家」白文長方印，即是他收藏有鈔本宋《乾道臨安志》三卷、鈔本宋《淳祐臨安志》六卷與宋大字本《咸淳臨安志》九十五卷（合計百餘卷）後所刻。傅增湘的「雙鑑樓」朱文長方印，宣告他收藏有南宋刊《洪範政鑑》與《資治通鑑》的難得書緣（都有「鑑」字）。



圖 13 鄧邦述藏印

（十一）收藏時地印

若是說到會影響文人收藏（數量或質量）的因素，這可從兩個方向討論，主觀來說，文人在不同時期可能會有不同偏好，或因經濟情況改變而目標轉移；客觀來說，像是戰亂會影響個人收藏與市場行情，或因公旅外可發現稀見圖書與售價較便宜等。不管如何，吾人確實能從一些強調時、地的藏書印裡，嗅得一些關於印主或時代的訊息。例如，鄧邦述的「雙漚居士/六十歲前/收藏圖籍」朱文長方印，寓有鄧氏六十歲時（1928），群碧樓精品即將賣給大學院的紀念之意。藏書家蔣維基（字子壘，浙江烏程人，?-1860）的「咸豐庚申以後收藏」朱文長方印，即代表咸豐十年（庚申年，1860）後，雖逃避英法聯軍戰亂仍艱苦收書的處境。清末駐日官員徐承祖（字孫麒，江蘇六合人，1842-?）的「孫麒氏/使東所得」印（圖 14），能顯示孫氏於域外訪求文獻的獨特收穫。



圖 14 徐承祖藏印

（十二）校讀印

不论文士或藏書家，買書無非是想獲取知識，而閱讀前的整理校對也是確保內容無誤的重要工作。故這類藏印也常常出現在各式古籍中。例如，學者許瀚（字印林，山東日照人，1797-1866）的「印林/手校」印（圖 15）、文人凌霞（又名瑕，字子與，浙江歸安人，生卒年不詳）的「凌瑕/手校」朱文方印、學者盧文弨（字紹弓，浙江餘姚人，1717-1795）的「武林盧/文弨手校」朱文長方印等。



圖 15 許瀚藏印

（十三）販書印

現代圖書有版權頁可宣告版權及著作權，書店賣書也常用標籤來標示書價、店號。雖然古書有相同功能的「牌記」或「書名頁」，但既沒統一格式也無強制律定，所以一些出版者或書商會刻此類印章來輔助。例如，明代出版家楊爾曾（字聖魯，浙江錢塘人，生卒年不詳）的「九/鼎/之/圖」印（圖 16）與「夷白/堂」白文長方印，即是其「夷白堂」書鋪出版時部分採用的版權及商標印。藏書家黃丕烈的「滂喜園發兌」、「滂喜園黃/家書籍舖」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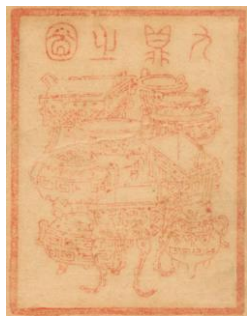


圖 16 楊爾曾藏印

「蘇城圓妙觀察院場」等朱文長方印，則是其「滂喜園」書鋪刻書的出版用印，且具有一定廣告功能。書商周永德（字達三，四川成都人，1868-1922）的「四川成都志/古堂經售章」、「志古/堂」等朱文長方印，即是其「志古堂」書鋪販書時據以憑證的經銷章。

（十四）肖像印

現代書籍的內容介紹頁，常會放上作者照片讓讀者參考，而古代藏書家，也有人會將肖像刻入印章中。這種印記看起來猶如坊間大頭貼，除能加強表示所有權外，更有大方展現個人藏書與讀書風采的意味。例如，學者陳鱣的「仲/魚/圖/像」朱文長方印，雖然只是一方小印，但頭像刻的活靈活現，也是此類藏印的先聲。陶澍的「印心石屋主人/而眉龐而髯/長仙心儒素而佛/賜手此一卷烏奕書香」印（圖 17），手持典籍的印主肖像搭配上典雅用詞，儒者風範儼然而立。袁克文的「百/宋/書/藏/主人/廿九/歲/小/景」朱文長方印，係篆刻名家王大炘（1869-1924）操刀刻成，畫面自然不做作，如實紀錄了袁氏年輕時的讀書風采。



圖 17 陶澍藏印

（十五）閒章

除了上述各類型外，文人們還常常會刻上幾方印，有表示生平志向、有直抒個人情懷、有講述得書心情、有展現詩詞名句、有陳述惜書心願，更有妙語自嘲者，內容可謂包羅萬象，在此以「閒章」名之。例如，季振宜的「吾道在/滄洲」印（圖 18），語出朱熹〈水調歌頭〉：「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隱喻了個人極想出世隱居的心志。清代藏書家尤貞起（字雪霞，浙江海寧人，生卒年不詳）的「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白文長方印，則生動地呈現印主豁達的人生觀。

清初藏書家陳昂（字子龍，浙江秀水人，生卒年不詳）的「陳氏藏書/子孫永寶」朱文長方印，深寓希望後人愛護藏書的期許。藏書家方功惠（字慶齡，湖南巴陵人，1829-1897）的「書/奴」朱文長方印，雖有自嘲意味但卻直道其愛書心聲。學者錢儀吉（字藹人，浙江嘉興人，1783-1850）的「此身原在/最高枝」朱文長方印，係採袁枚〈落花〉詩佳句入印，呈現印主獨特的浪漫情懷。書畫家錢瑤鶴（字



圖 18 季振宜藏印

白仙，江蘇長洲人，?-1830)的「詩書/敦宿好」朱文長方印，採用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佳句入印，表現出他熱中詩書的優雅情趣。

五、藏書印的學術價值

說到藏書印的價值，《中國藏書家印鑒》分「史料價值（含遞藏源流、鑒定版本、補充書史等）」、「藝術價值」等二點（林申清，1997，頁 5-7）；《中國藏書樓》有「版本鑒別依據」、「鑒別版本線索」、「了解遞藏源流」、「史料價值」與「藝術價值」等五點（任繼愈，2001，頁 271-274）；《古書版本鑒定》為「推斷版刻時代」、「版本鑒別參考」與「看出遞藏源流」等三點（李致忠，1998，頁 162-165）。所論不出「版本鑒定」、「遞藏源流」、「補充史料」、「藝術價值」，且舉例偏理論式，如論版本鑒定價值云：「若是一書上鈐有“翰林國史院”長方形朱印，則此書版刻就不會晚於元代」（李致忠，1998，頁 163）；抑或沒有講清細節、來源，如論遞藏源流價值：「如宋本《金石錄》十卷，從馮文昌經江立、鮑廷博、阮元、韓泰華等，最後歸入潘祖蔭滂喜齋，幾經輾轉，均有印鑒可徵」（林申清，1997，頁 6）；更有慣見之範例沿用，如論史料補充價值：「朱彝尊，清史有傳，但生卒不詳。然其印章“我生之年歲在屠維大荒落月在橘壯十四日癸酉時”印，……恰好彌補史書之缺」（任繼愈，2001，頁 273）。

上述採廣泛式概論，舉例多但不深入。本節則著重實證與延伸應用，除使用「版本鑒定」實例說明，還把「遞藏源流」考查運用於「藏書史」、「圖書史」研究專題上，並將「補充史料」分成「專人研究」、「文獻補充」來談，而「藝術價值」因較易理解且篆刻史著作已有深論，故而略之。

（一）版本鑒定的佐證

對書商來說，古籍的價值往往與印記數量成正比，若曾經名家收藏，書價勢必翻漲。所以，想成為一個能賺錢的書商，具備藏書印的學養，必然是基本功夫；對研究者來說，藏書印跟版式、行款、字體一樣，都是鑒定版本的重要參考。當然，前提是要先具備藏書印與圖書史的各種知識，因為，就藏書印本身來說也要先鑒別真偽才行。如清康熙間（1662-1722）鈔本《魯詩世學》卷首上方所鈐「絳雲/樓」朱文方印，就因篆文結體拙劣、不見於印譜或專著錄載與鈐蓋位置不合常理（鈐於卷首上方）而

令人懷疑。又，鄧邦述藏書不僅是傳圖館藏重要來源，過去他為藏書所進行的鑒定工作，後來也成了館方審定版本時的重要參考。這些鑒定資料，除表現在《群碧樓善本書目》中，而鄧氏鈐於書上的「宋刻本」、「元刻本」與「嘉靖刻本」等印，亦能快速提供線索。但要注意的是，其鑒定成果不能一概相信，謹慎的多方查證才能避免誤判。像有部《五經白文》，鄧邦述原鑒定為宋刊巾箱本並鈐「宋刻本」印，該書避諱匡、貞、慎、恒等字，不避玄、敬、弘、殷、樹等字，乍看應宋刻無誤，但考查後發現書口所記刻工如王良、劉潮、馬龍等，大多活動於明正德至萬曆間的蘇州地區，故而改定為據宋本覆刻的明刊本。

此外，因印章材質為金石、竹木，流傳時間相對更長，故鑒別時還需注意到，縱使印章為真，並不等於舊藏者與版本皆為正確。每個人都會有特定習慣，故觀察「鈐印規律」有助於舊藏者之考證，印記資料庫則能協助吾人進行分析。例如，在印文欄位鍵入「群碧樓」進行檢索，可以看到像是「群碧樓」（編號為 19111201.001）朱文長方、「群碧/樓」（編號為 19111201.009）白文方印等鄧氏用印。若點選前印進入印記資料頁面，於「館藏鈐印處」欄位可以看到，在目前發現的 99 處鈐印位置中，就有 98 方蓋在前扉頁裡，這方印總是鈐在前扉頁，此乃其專屬用法，日後要是看到此印鈐在它處，勢必得特別注意。接著點選後印瀏覽，可看到目前發現的 922 處鈐印位置中，有 921 方蓋在卷目（序）或每冊正文首頁，因此印普遍鈐於起始處，故同樣也是判別依據。

（二）藏書史研究的實例

對藏書史研究者來說，研究一地區的藏書風氣，則能從「遞藏源流」去觀察。遞藏源流，係指圖籍流傳過程中的擁有者之傳遞脈絡。一部書出版後，流傳過程中經過了收藏者的閱讀、加工，如題跋、批注、點校、鈐印等，都會使此書產生新的內容與意義，故若能理清遞藏源流，不僅有助於人們對該書的瞭解，也更能突顯其價值所在。而保留在古書上的藏書印即是探討之實例。

明清以來，江蘇常熟地區就是藏書者的重要聚集地，於是，該地藏家的某些喜好與收藏特色慢慢傳揚後，在當時，不但一家啟發一家，之後更隨著時代推移，一代代影響下去。因而藏書史中形成了所謂「常熟派」。此派特點為：1. 普遍重視宋元刻本、鈔本與稿本；2. 特別愛好抄書與重視鈔本；3. 收藏偏重經、史，具有尊經、史的傾向；4. 善於利用藏書，積極提倡藏書流通；5. 具有獨特的傳承型態（張家榮，2008，

頁 66)。藏書印一般鈐於卷端右下角空白處，若該書歷經多人遞藏，則常會看到藏印從右下依序向上鈐蓋的的情況，而通常最下面的印主就是最早的藏書者。剛好，傅圖藏烏絲欄舊鈔本《沈下賢文集》，考察書中卷端右下角至上方的「絳云/樓」、「錢印/謙益」、「葉氏/珍藏」、「石君」與「張印/金吾」等印後，得知該書歷經常熟藏書家錢謙益（字受之，1582-1664）、葉樹廉（字石君，1619-1685）、張金吾（字月霄，1787-1829）收藏（圖 19），此為常熟派藏書流傳的實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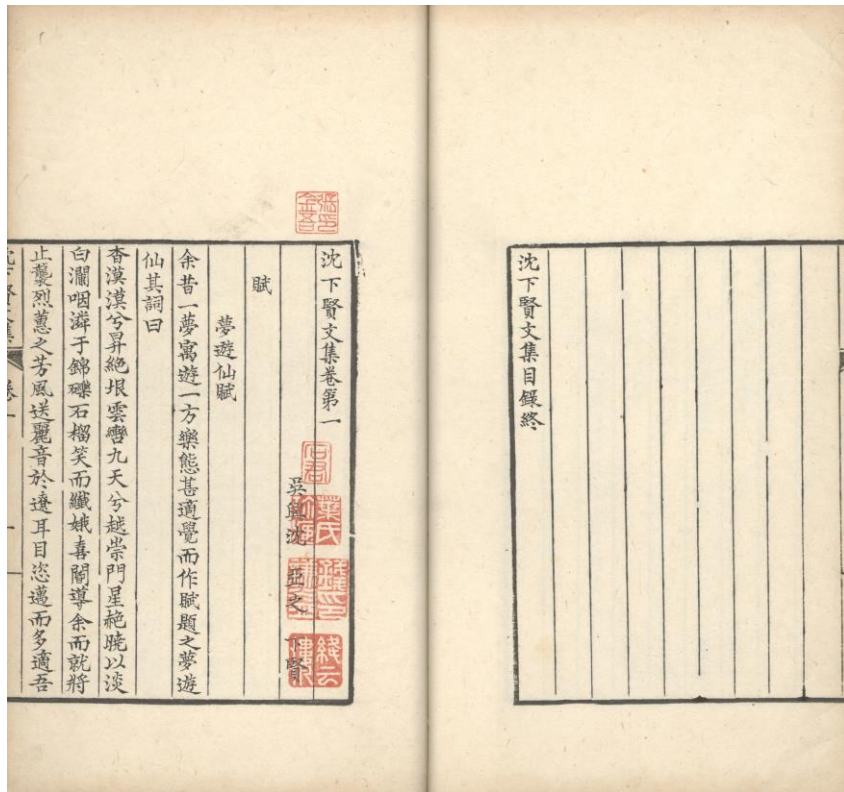


圖 19 具體呈現常熟派藏書流傳的《沈下賢文集》

同時，明清以來「藏書密集的江浙地區逐步形成了不少藏書中心，如浙東和浙西的杭、嘉、湖地區，江蘇常熟、金陵、吳縣等地。其中，……僻在海隅的浙東地區藏書家，也形成了自己的藏書流派—浙東派」。此派特點為：1. 較重視當代人的著作；2. 重視收藏史部、集部圖書，且史部書也不限於正史；3. 注重實用，故對圖書的流通態度略顯保守封閉；4. 因為管理嚴格與克守家業的精神，使得藏書世代相傳（曹培根，2002，頁 25）。翻覽並查考烏絲欄寫校本《中興館閣續錄》中的「武林盧/文

詔手校」、「石樵」、「八千卷樓/珍藏善本」等印，發現此書曾經盧文弨、施紹武（號石樵，1770-1814）、丁丙（字嘉魚，1832-1899）收藏，他們皆為杭州人士，此亦為「浙東派」藏書流傳的例證。

（三）圖書史研究的線索

在圖書史的探討中，印記成了追查文獻聚散的線索。翰林院是清朝中央單位，設有掌院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等職，負責陪侍皇帝論學並兼任顧問。當國家有編纂圖書之事，翰林官也大都參與其中。翰林院設有典籍廳，掌章奏、文移及差役事務，並保管圖書。典籍廳藏書專供翰林官們參考，其中所藏，像是《永樂大典》副本與編纂《四庫全書》時徵集的各式「四庫採進本」、「四庫底本」，不時有被官員私拿的事例。

丁國鈞（?-1919）述《永樂大典》的遺失：「原書本萬餘冊，陸續散失。光緒乙亥重修翰林院，檢置此書不及五千冊，至癸丑則僅存六百餘冊。相傳諸翰林入院時，僕預攜衣一包，出時盡穿其衣，而包書以出，人不覺也。又密邇各國使館，聞每大典一冊外人輒以銀十兩購之。館人秘密盜書不可究詰，致亡失益速。又，庚子大劫，翰林院盡入使館。大典尚存三百餘冊，殆付劫灰矣。余所見二冊，友人得於廠肆者。聞尚有三冊在肆中，不知為何人購去也」（丁國鈞，1994，頁 1017）。可見，有些人因利而拿。葉德輝則直接點出翰林官文廷式（1856-1904）竊盜《永樂大典》事（葉德輝，1999，頁 222），此乃因學術價值而取者。官員私拿的情況並非特例，翰林官繆荃孫所說可謂鉅細靡遺：

其盜書之法：早間入院，帶一包袱，包一綿馬褂，約如《永樂大典》兩本大小。晚間出院，將馬褂穿於身上，偷《永樂大典》兩本，仍包入包袱內，如早間帶來樣式。典守者見其早挾一包入，晚復挾一包出，大小如一，不虞其將馬褂加穿於身，偷去《永樂大典》兩本，包於包袱內而出。久之，《永樂大典》三百餘本，又掃地無餘。太史並謂：每次偷書，以兩本為最合式，恰如綿馬褂一件大小，多則為人所易覺。其偷書之法，真極精巧刻毒，不謂竟於翰林院諸公行之。我朝養士數百年，末流乃竟如此！（劉聲木，1998，頁 49-50）

儘管一針見血，但他沒想到，自己私取「四庫底本」的行為，卻在後人研究中被揭發。從劉乾（1990）的研究可知，覬覦並竊取翰林院「四庫底本」典藏的嗜書行家，主

要還是那些飽讀詩書的歷朝翰林官員們，如乾嘉時的法式善、道光時的路慎莊、錢桂森、袁芳瑛、周星譽與光緒時的盛昱、繆荃孫等，都是其中比較有名的。

傅圖館藏多部鈐有翰林院印的「四庫採進本」、「四庫底本」，其中幾部的舊藏者，剛好就是學者點名的那些官員。例如，舊鈔本《歷代宅京記》，有錢桂森（號犀庵，江蘇泰州人，1827-1899，時任翰林院編修）的「小/天目/山館」朱文橢圓、「犀盒/手校」等印（圖 20）；另一舊鈔本《聖宋文選全集》，亦有錢氏「教經/堂錢/氏章」、「犀/盒/藏本」諸印；舊鈔本《樂菴先生語錄》的「古潭州/袁臥雪/廬收藏」印，則為袁芳瑛（字漱六，湖南湘潭人，1811-1859，時任翰林院編修）所有。此外，學者提及的周星譽（字叔雲，河南祥符人，1826-1884，時任翰林院編修），蕭穆（1835-1904）述其事蹟云：「予又往聞周季況太守星詒云其七兄勻叔觀察星譽，在翰院時曾零竊」（清·蕭穆，1995，頁 56-57）。舊鈔本《獨醒雜誌》正好有其弟周星詒（字季貺，1833-1904）的「季/貺」、「周印/星詒」等印，推測來源當與其人有關。這些都是運用印記討論文獻聚散的例子。



圖 20 《歷代宅京記》上的錢桂森藏印

(四) 專人研究的參考

就專人研究來說，若想研究某位文人的思想，必然會先從作品與相關史料著手。要是在基本資料都掌握後，能再把目標放在其藏書上，則常常會有不錯的發現。因為，人的思想養成與學習歷程關係密切，所以，此人看什麼書、寫過什麼題跋或批語，當然是絕佳線索。正好，藏書印為尋找專人舊藏提供了重要方向；若使用印記資料庫的印主欄位檢索，除了可快速看到某位學人舊藏，更能得到延伸查詢與閱覽的額外效益。假設，吾人欲研究王韜的學術思想及養成脈絡，除了先從《淞濱瑣話》、《弢園文錄外編》、《瓮牖餘談》等著作入手外，還可透過印記資料庫收集資料。首先，於印主欄位鍵入姓名查詢，可看到資料庫現收錄王氏藏印 14 方，此時，若點選印主王韜，可連結至「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資料庫」瀏覽人物資料。接著，再點選「長洲/王韜」（編號為 04190001.002）進到印記資料頁面，從下方「館藏鈐印處」欄位，則能獲知其舊藏的兩部圖籍。其一，《參寥子詩集》（書後有王氏題跋識語）是宋僧釋道潛詩集，另一《蘅華館雜錄》則為其著作手稿本，皆可據以研究其生平與學術思想。又，查詢印主王念孫可得知其舊藏《呂氏春秋》，該書有其校勘、訓釋批注，可補充其《讀書雜誌餘編·呂氏春秋》，亦為有助後人理解《呂氏春秋》內容注釋及研究王氏《呂氏春秋》學術的第一手材料。他的另一部舊藏《劉練江先生集》，係學侶劉台拱（1751-1805）六世祖劉永澄（號練江）文集，劉台拱曾送此書給好友汪中（劉文興，1975，頁 12），推測其收藏淵源亦同。

(五) 文獻補充與糾謬的價值

最後，就藏書印所能提供的史料價值來說，很多時候，一些紙本文獻沒有記載的細微人事，剛好都如實記錄在藏書印中，雖瑣碎卻也彌足珍貴，而古今文人的藏書片段也能得到彰顯。近人王澐有「冬飲廬」藏書樓，據其《冬飲廬藏書題記》可知所藏四部皆備，大部分經過整理校定，兼具美觀與可讀性（王澐，1948）。其藏書事蹟見載於史料不多，但吾人透過「雙煙/室藏」、「澐/印」與「溧水王氏無想山房藏書」等印考察館藏，卻能找到多部王氏舊藏，這不僅可發掘其生平故實，也能藉以宣揚其藏書學術。

清代曲阜孔氏延續傳統書香門風，代代不乏喜藏愛書者，如前述孔繼涵為孔子第六十九代孫，即以「微波榭」藏書樓聞名於世。另，孔繼涵侄孔廣森（字眾仲，1752-1786）為知名經史考證家，相信也有不少藏書。但很少有人聽過孔繼涵次子孔廣根（字心仲，

生卒年不詳)的生平及藏書活動。孔廣森有個愛書的兒子孔昭虔(字元敬, 1770-1849),不少史料也記載了他的學衛生平。然而,孔廣森侄孔昭薰(字惠如,生卒年不詳)的好學嗜古,卻淹沒不彰。藤梧館烏絲欄鈔本《寒山堂金石林時地考》裡,首有孔繼涵的「孔繼/涵印」、「莊/谷」等印,後有孔廣根的「廣根」印,中有孔昭薰「孔昭/薰印」印(圖 21),這不僅能凸顯孔氏儒風,個別人物的藏書事蹟也能得到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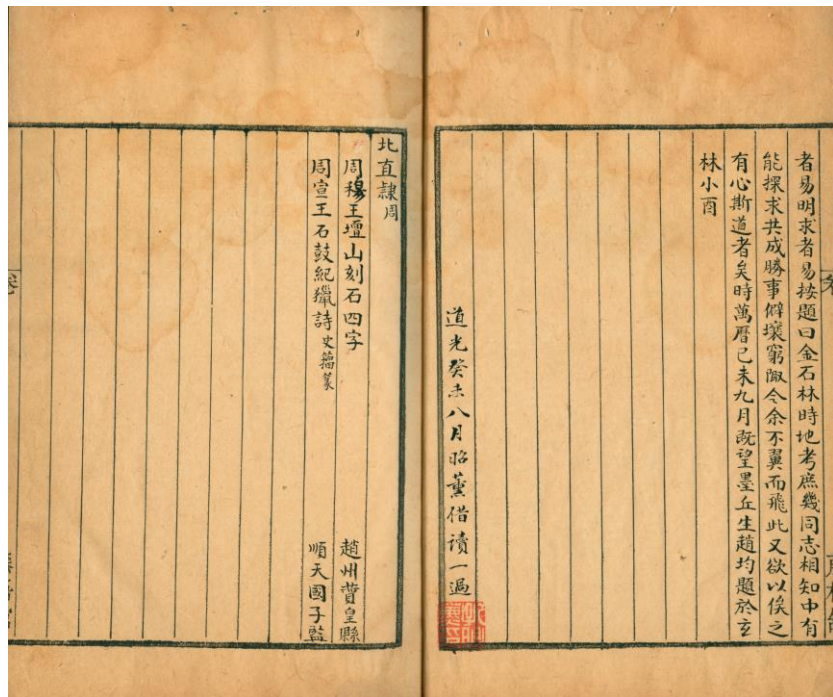


圖 21 孔昭薰題識與鈐印

此外,使用印記資料庫查詢,透過豐富清晰的圖文頁面,除了補充,亦能發現一些印鑒出版品的缺誤。如《善本藏書印章選粹》所收紀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人, 1724-1805)「一六/淵海」印,實為黃宗漢(字季雲,福建晉江人,?-1864)藏印;黃丕烈的「後百/宋一廬」印,實為袁克文藏印;彭氏(南昌)的「南昌/彭氏」、「知聖道/齋藏書」與「遇者善讀」等印,皆是彭元瑞(字掌仍,江西南昌人, 1731-1803)所有(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 1988, 頁 113、192、200-201)。又如《近百年書畫名人印鑒》所錄沈曾植(字子培,號巽齋,浙江嘉興人, 1850-1922)「赤堇/山人」印,實為葉元堦(字心水,浙江慈溪人, 1803-?)所有(于連成, 2001, 頁 87)。

六、結 論

藉由小小藏印，我們得見文人珍藏，仔細翻閱前人手澤，此種貼近歷史人物的感覺，具有筆墨難形的喜悅。古今文人如過江之鯽，史料不能皆載；方方藏印猶點點繁星，印譜亦無法盡收。雖然，這侷限造成後人查考的困難，但也讓人總嚙迎刃而解之欣喜。下為個人考釋印記的心得談。

首先是善用題跋與批校。收藏者常會留下紀錄，故原書的題跋或批校都有考釋印記的參考訊息。如清鈔本《吳志仁先生遺集》，首冊扉頁有王禮培（字佩初，湖南湘鄉人，1864-1943）跋云：「此冊為海寧陳仲魚藏書，卷首有『陳鱣收藏』印。先生專門漢學，所著甚富，凡所收書，皆手自校讎，首末如一」。又如藍格彩繪舊鈔本《天元玉曆祥異賦》，若非「此身原在/最高枝」朱文長方印蓋於錢儀吉跋後，不然的話，此類閒章還真的頗難考查。還有，檢核相關書目或史料，不僅在疑似印主的藏書目錄中尋找印證，也透過其他書目或史料追尋線索。這種方法，過去藏書家很常用，如黃丕烈跋宋刊《輿地廣記》殘本：「有宋本圖記一，有季振宜藏書圖記一，知《延令宋板書目》有《輿地廣記》廿一卷，即此本也」（清·黃丕烈，1999，頁152）。又如，南宋咸淳元年鎮江府學刊元明遞修本《說苑》上有汪文琛（字厚齋，江蘇長洲人，生卒年不詳）「臣印/文琛」、「厚/齋」等印，但鄧邦述跋語云起初不知為何人所有，後覽《藏書紀事詩》乃豁然開朗。

再者為敏感聯想，判別同異。除了平時多翻多看外，對於經常同時出現的印記，更要隨時記錄，重點是要大膽的懷疑，持續地找證據。如明萬曆間（1573-1619）夷白堂刊本《海內奇觀》為明代出版家楊爾曾所編刊，因為他有「夷白堂」書舖，故書中「夷白/堂」、「夷白/堂印」等印，顯然為楊氏所有。同書另有「九/鼎/之/圖」朱文長方印，雖朱色濃淡與前二印近似，惜缺乏文獻佐證而無法論定。後翻查《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發現國圖收藏的兩部同版本《海內奇觀》，其相同位置皆鈐有該印，書志並云：「此三印與前書所鈐雖未盡相同，但形式類似，信為同一版刻印本，而由書肆鈐蓋肆名印記也」（國家圖書館特藏組，1997，頁152-153）。可見，經常一起出現的印記，雖然未必是相同印主所有，但卻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最後則是謹慎的依理判斷，辨別矛盾之處。如烏絲欄舊鈔本《珊瑚木難》鈐有「珊瑚閣/珍藏印」，鄧邦述題跋云為納蘭性德（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1655-1685）藏印，但從清乾隆間（1736-1795）朱絲欄鈔本《御選明臣奏議》亦有此印的情況來看，

可明顯看到關於時代的矛盾。據考，此印實為百齡（字菊溪，漢軍正黃旗人，1752-1815）所有（鄭偉章，1999，頁 486-487）。

參考文獻

- 丁國鈞（1994）。*荷香館瑣言*（叢書集成續編·子部，9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二南堂工作室編輯（1999）。*二南堂印譜*。臺北市：南堂股份有限公司。
- 于連成編（2001）。*近百年書畫名人印鑒*。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 王北岳（1997）。篆刻之美。載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國文人雅趣印章之美*（頁 8-9）。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 王澐（1948）。*冬飲廬藏書題記*。南京：通志館文獻委員會。
- 任繼愈主編（2001）。*中國藏書樓*（壹）。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 李致忠（1998）。*古書版本鑒定*。北京：文物出版社。
- 沈樹華（2009）。*中國畫題款藝術*。上海：學林出版社。
- 周少川（1999）。*藏書與文化：古代私家藏書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明·徐師曾（1997）。*文體明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312）。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林申清編（1997）。*中國藏書家印鑒*。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林申清編（2000a）。*日本藏書印鑒*。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林申清編（2000b）。*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唐·張又新（1983）。*煎茶水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44）。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唐·張彥遠（1993）。*歷代名畫記*（中國書畫全書，1）。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1988）。*善本藏書印章選粹*。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1997）。*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史部*（二）。臺北市：國家圖書館。
- 張家榮（2008）。*孫從添《藏書記要》研究*。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 曹之（2002）。*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
- 曹培根（2002）。藏書流派及虞山派、浙東派比較。載於曹培根編，*常熟藏書家藏書樓研究*（頁 22-33）。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 清·黃丕烈著、屠友祥校注（1999）。*堯圃藏書題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 清·蕭穆（1995）。*敬孚類稿*（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56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葉忠海、羅秀鳳（1994）。南宋以來蘇浙兩省成為中國文人學者最大源地的綜合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1，63-68。
- 葉德輝（1999）。《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
- 葉德輝（2005）。《藏書十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劉文興編（1975）。《劉端臨先生年譜》。香港：崇文書店。
- 劉乾（1990）。「四庫底本」漫談。《文史知識》，109，90-93。
- 劉聲木（1998）。《菴楚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
- 鄭偉章（1999）。《文獻家通考（清—現代）》。北京：中華書局。